

# 第一章

## 当代土耳其

每年 11 月 10 日上午九时零五分，土耳其境内一切活动均暂时中断。车辆停止行驶 乘客走出车来 悄然肃立 举国上下默哀五分钟，以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的忌辰。

阿塔图克于 1938 年辞世。现代土耳其民众，多是在他辞世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只是通过学校教育和民间传说才知晓阿塔图克其人其事的。然而土耳其至今仍受到他深远的影响。他的画像到处可见 虽然土耳其在他死后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但这个国家所遵循的 基本上还是他生前制定的指导方针 建立及捍卫疆域有限的土耳其民族国家 启迪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 摆脱伊斯兰教对国家、法律和教育的控制；不单要物质生活西化，社会制度、人们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也应西化；迅速发展经济；避免阶级划分 增强团结观念 忠于共和政体 最后 努力建立和睦的外交关系。当然 倡导并制定这一系列方针 并非全是阿塔图克一人的功劳 再说 若非前人一百年来致力改革而奠定了基础 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建树。但他毕竟是建立现代土耳其的主要推动力 而上述某些目标 尤其是建立民族国、政教分离和共

和政体这三项目标 纯是他个人的创见。综合阿塔图克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有助于我们观察今日的土耳其。

土耳其民族国 今日的土耳其民族国 结构坚实 领土基本上限于土耳其人聚居的区域。土耳其的疆域包括欧洲东南的一角——色雷斯 但它的主体则是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高原 位于波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等咽喉通道的另一边。土耳其的总面积几达 30 万平方英里 略大于得克萨斯州 约等于法国与大不列颠两国面积的总和 远远比不上当年庞大的、异族杂处的奥托曼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奥托曼帝国进一步分崩离析 现代土耳其即在其废墟中崛起 )土耳其共和国已不再背负古老帝国的包袱。现在的疆土更易于管辖和防御。今日土耳其国土的主体安纳托利亚高原，由树木葱茏的爱琴海岸及沿海的良港 向东延伸 横贯地势崎岖的中部高原 直至东部的山地 其最高点是大阿勒山 西方人士一般称之为阿拉拉特山)。这一带本是塞尔儒克突厥族——奥托曼土耳其人的祖先——定居的地方。当年奥托曼帝国由此地向外扩张 如今此地又成为共和国的心脏地带。从前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位于波斯普鲁斯海峡在欧洲的海岸 现在它仍是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 拥有近 200 万人口。但共和国的象征 则是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首都安卡拉 它在最近半个世纪里 由一小镇迅速发展成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国家。据 1965 年人口普查报告 全国居民约 31391000 人。目前还没有上述总人口的语言分类资料，但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居民，必定在 90% 以上 因为根据 1960 年人口普查报告，当时已达到这个百分比。至于其余的居民，1960 年有 6% 以上操库尔德语。还有一些为数更少的居民说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拉兹语、“犹太语”、乔治亚语、切尔

克斯语、保加利亚语或克罗地亚语。这一小部分人的祖先有些是被奥托曼土耳其人所征服的；有些则是为了逃避西方基督教国家、沙皇俄国或苏联政权的迫害而在 16 至 20 世纪中某个时期逃到土耳其栖身的。与其奥托曼祖先相对照，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特征就是民众语言的单一性——尽管还存在着方言和口音方面的某些差异。这个国家的人口，主要由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组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 15 岁以下。共和国建立后的头 20 年，很多人担心人口不足。但近年来，人们转而担心人口过多。每年 2.5% 至 3% 的人口增长率已促使政府着手推行一项控制生育的庞大计划。

**土耳其民族意识** 土耳其人深具民族意识，即土耳其民族感。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中亚细亚突厥族一脉相传的后裔，有纯血统的土耳其人。尽管有些家族取了“厄兹丘尔克”（“纯土耳其人”）这个的姓氏。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通过联姻和皈依伊斯兰教，土耳其人已在很大程度上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融成一体。今日共和国激发的，不仅是对突厥族早期历史的兴趣，还有对突厥族来临前安纳托利亚各部族历史的兴趣。这段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特洛伊人和赫梯人。其后迁徙来的民族，包括突厥族人，都无可避免地从特洛伊文化、赫梯文化及其后代那儿吸取到不同的特性。现代土耳其人的土耳其民族意识，是对土耳其文化——特别是语言——一体性的认识，对共同历史的认识。简言之，是对土耳其民族共同性的认识。这种整体意识，是到共和年代才奠立的。这方面的工作尚未完成，有些土耳其人还没有那样的意识。

在奥托曼帝国时期，一个土耳其人可能视自己为回教徒、奥托曼苏丹的臣民，或是某一地区的人，很少会视自己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一词，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奥托曼贵人对未受过

教育的土著或乡民的蔑称。通用的土耳其语里，搀杂大量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来的词汇，因此作家和政府官员使用的那种书面语，一般乡民是看不懂的。在奥托曼帝国后期，已着手简化语言到了共和年代更加速这方面的工作。语言“纯化”运动在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峰，即使日常通用的一些阿拉伯语的词汇也一律用陌生的土耳其语词汇替代。虽然这个语言“纯化”运动现已缓慢下来，在 60 年代，仍在用土耳其语逐步替换阿拉伯语词汇。政府不时颁布告示，称政府已通过法令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土耳其词语。语言固然是土耳其民族意识最明显的标志，但近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绝不止于语言的“纯化”，而是植根于忠于民族国的共同信念。今日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首先会视自己为土耳其人，然后才会想到自己是回教徒或某地区的人。未受过教育的村民也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想法。

摆脱回教的束缚 现代土耳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回教对公众生活的束缚已告解除。但官方的非宗教政策并未改变人民的宗教信仰——土耳其 99% 的居民都是回教徒。虽然一些受过教育、居于城市的回教徒，和其他国家受过教育、居于城市的基督徒一样，在思想和习惯方面并无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回教的影响还是很强的。回教的迹象比比皆是：不单有昔日的清真寺，还有新建的清真寺，斋月的白昼禁食，一船船、一车车去麦加圣地朝拜的善男信女。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时说“如果真主愿意”之类的词句；尽管法律明文禁止一夫多妻制，但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已婚女子还是多于已婚男子；一艘新购置的驱逐舰，桅杆上会高悬着一本《可兰经》。1950 年以来，在公开场合举行宗教仪式，遵守一些惯例的现象，益见普遍，而且也更为政府所支持。宗教仍能掀起反动的政治运动。

然而土耳其至今还奉行阿塔图克在 20 年代制定的政教分

离方针。过去曾是最庞大的回教帝国，如今则成了世俗的共和国。过去的苏丹声称自己是全体回教徒的“哈里发（教主）”，如今则既无苏丹，也无“哈里发”，只有一位不担任任何宗教职务的总统。过去法律依据的是“谢里亚特”——回教的法律，如今的法律则是根据西欧世俗法典修定的。过去教育主要是宗教教育，为回教学者所把持，并由宗教慈善基金资助；如今教育则已世俗化（尽管小学恢复了宗教课程），而教师本身自小亦受世俗教育，并由政府付给工资。

土耳其的西化 现代土耳其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说，自从土耳其人离开中国边疆向西迁徙、自从他们舍黄教和佛教而接受西方主要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那天起，就始终面向西方。也可以说，奥托曼帝国始终是属于西方的，因为它所建立的基地，是拜占庭的核心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而不是回教最初的大本营阿拉伯和波斯。但自 16 世纪以后，奥托曼帝国和西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并不限于回教同基督教的分歧，但却因两者的分歧而加深。这道鸿沟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在工厂、武器以至小玩意、衣着等物质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乎同样明显的，而且更为重要的分歧，是人们对变革与进步，以及科学、教育、商业的态度。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奥托曼帝国的君主和政治家有意识地而且有增无已地努力用不同办法消除这道鸿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托曼帝国已相当程度地西化，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化的步伐越发加快了。

如今物质方面的西化，已是一眼可见，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在伊斯坦布尔，西方式的交通拥挤已属常事——但如果你避开埃及商场前凝滞不动的汽车群，在商场后较窄的街中，还是会入纯属东方式的马车阵里，动弹不得。电冰箱、收音机、录音机、洗衣机、最新的抗生素品种、形形色色的塑料小玩意等，也越来

越普及，其中不少均为当地产品，并非由国外进口。

整个政教分离的进程，也是西化的一部分。公立学校体制也像法律体系那样，一开始就是按西方模式（在这方面主要是按法国模式）规划的。学校不单是西化的标志，也是西化的主要媒介，以 1928 年采纳的欧化新字母传播知识。在知识普及方面，土耳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民众识字率现在已上升近 50%。大学也是采取西方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国只有一所大学，设在伊斯坦布尔。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全国已有 7 所大学，包括两所专科技术大学。学习西方语言也日益普遍，二次大战前主要学法语，战后则主要学英语。土耳其的语言，夹杂不少外来语。有一个时期西化似乎“化”过了头，诸如 *fuat*（晚上）、*garshefi*（车站站长）、*bröve*（专利）之类的词，尽是从法语中套用过来的“进口货”。二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作家纳米克·昌其抱怨说：“我们试图把自己从阿拉伯沙漠和色拉子花园中解救出来，却一头栽入巴黎拉丁区的迷宫。”不管怎么说，数以百计的西方词语，如 *futbol*（足球）、*parti*（社会聚会）等，已在大众语言中牢牢生根。时下，西方音乐与土耳其的民间音乐同样流行。先锋派戏剧、绘画、雕塑、诗歌、小说，源源不断出自欧化艺术家的手笔。他们中有些人已臻西化的极点，现正自觉地复兴舞蹈、设计和曲调方面的“民俗”主题。

现代土耳其的西化程度，可以用一组三重的对比尺度来衡量——按地理，东部较之于西部；按人口，城市较之于乡村；按社会地位，男子较之于女子。一般来说，土耳其靠近欧洲的地区，西化程度高于邻接伊朗边境的地区。例如在 1963 年，伊斯坦布尔有 16170 辆私人汽车和 12370 辆计程车，而宾戈尔省只有 1 辆私人汽车和 2 辆计程车。当然上述数字主要显示两地不同的道路和财富状况，但由此我们也可约略看到两地的教育以及观念

西化程度的差异。1966年东部地区两个相邻的省份穆什和埃尔佐鲁姆发生灾难性地震，那里的落后状况始完全暴露。

城乡之间的悬殊差别 也可就物质生活加以鲜明描绘 但人们对宗教、社会的态度 同样能反映出城乡的差别。1950年马卡尔所著《我们的那座村庄》出版 在城市的有识之士中轰动一时。作者是一所乡村学校的年轻教师 他以现实的笔调 刻画出农村物质的匮乏 同时展示了人们头脑的贫乏——村民的多疑、无知和迷信。土耳其的许多城市居民 和其他各国的、甚至是美国的城市居民一样，对一些贫困、缺乏教育的穷乡僻壤根本一无所知。今日土耳其的科学家、医生、企业家、管理人员、学者、工程师和商人，虽然从数量上说仍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但就水平而论，不管用何种西方尺度来衡量都是属于上乘的 可惜的是 土耳其苦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有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尤以发展中国家为突出。有成就的人不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 就是去国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以及更优厚的待遇 不愿在本国的城镇或乡村工作。“人才外流”是个棘手问题。据1965年的统计数字 在国外执业的土耳其医生有二三千名 而无数的土耳其村庄却连一名医生也没有。

至于男女地位的差异，则随着社会等级的下降而越见明显。各项专门职业和商业工作是向妇女敞开大门的，好多妇女在这方面也卓有成就。妇女却不能像男子那样完全按自己的心愿行事 即使在有良好教育的城市妇女中也是如此 至于在外省小城镇中的妇女 仍然受到传统习惯的约束 在公众场合也许还得把脸蒙上。农村妇女在这方面倒能享受多一点的自由。

无论如何 西化纵使并非全面 却已是一股观察得到、持续不断的潮流。西方化始于19世纪中叶，时下已是势不可挡。它并不是依照某个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依样画葫芦，而是糅合西

方与土耳其文化，别创一格。

经济发展 随着现代土耳其经济的不断发展 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土耳其 3/4 的人口从事农业 提供粮食和主要出口物品——棉花、烟草、水果。自 1948 年以来，农业生产每年增长 4% 左右 稍稍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60 年代后期 土耳其的农业仍然有待发展。这里有机化的问题 要用拖拉机替代传统的铁头木犁和嘎吱作响的牛车。拖拉机已经相当普遍，1963 年全国已拥有 50000 台 而在 1948 年仅 1750 台。这里也有妥善使用、维修拖拉机和其他农机的问题。拖拉机已成了身价的象征。拥有拖拉机的农民有时试图拿它来参加赛跑、拔河 或者驾着它进城看电影。发展农业生产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如何引水灌溉较为干旱的中部高原 如何进行土地改革 使无地农民安心务农 如何阻止肢解小块农田 以便建立在经济上有生存能力的生产单元等。显然 与奥托曼帝国后期相比，一场农业革命正在进行之中 当然也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完成。政府中、报纸上展开的争论表明 这些问题已得到普遍重视。

工业化也在迅速提高 农业出口收益越多 能用于机械工业投资的外汇也就越多。时至今日 土耳其才开始出现工业革命的势头。在奥托曼帝国时期 尽管偶尔也作些努力 但大型工业的发展 微乎其微。眼下 土耳其拥有两座大型钢铁厂 分设在卡拉比克和埃雷格利 后者于 1965 年才点火开工。电力也在持续增长；由于幼发拉底河克班拦河大坝工程已于 1966 年奠定基石，电力的大幅度增长已是指日可待。除了生产纺织品、水泥、玻璃和其他工业品之外，1965 年又生产出第一辆国产汽车——阿纳多尔牌汽车（纤维玻璃车身），大部分汽车零件均系当地所产。铁、煤、铬、铜、石油等矿物资源正在开采。一条长 300 英里 由巴特曼炼油厂通往伊斯肯德伦港口的输油管，已于 1967 年投产。

工业化也有它自身的问题：资金的筹措；工业的设置——所设地区是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战略的考虑；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挣脱官僚主义的控制。

土耳其所发展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企业的混合体。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在国家指导和控制下发展经济，并由国家提供资金——是 30 年代所定下的基本准则，如今部分还在起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更注重实效，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生搬硬套。1963 年以后制定的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其目标是要达到 7% 的年增长率。今日去土耳其游访的人，既对此表示怀疑，又会产生谨慎的乐观主义情绪。经济发展问题确实不少，但机会也同样很多。某些实业家认为这个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的起点——资源就蕴藏在那儿，技术在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有待于满足。同其他中东国家——那些石油最大储存国除外——相比，土耳其前程似锦。

**促进社会团结** 现代土耳其是个没有阶级偏见、却有着森严社会等级的社会。这个貌似自相矛盾的论点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尽管社会各集团之间切实存在着种种分歧，但是土耳其人并不是按阶级来看待自身的——政党也不是按这种方式组建的；共和体制的意识形态避免作这样的区分，因而具有较大的、而且日见增长的社会流动性。从奥托曼帝国立国初期起，某个适逢其时的个人，也可能凭借战功、教育、宠幸或是机缘，平步青云，登上显赫的高位。今日的试金石则是教育。凡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能在政府机构、工业或商业部门找到施展身手的机会。直到不久以前，公立中学毕业生一经应征入伍，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军官。公立中学毕业生在整个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这个数字历年都在增长。文盲家庭的子女上学念书也越来越普遍了。

这么说来,土耳其存在着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其实总是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特殊阶层。纵观土耳其的全部历史,这个特殊阶层始终是社会的统治成分和推动因素。最初,它由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到了奥托曼帝国后期,开始把记者、律师、医生也包括进来。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托曼帝国手里接过了这个统治阶层——90%以上的总参谋部军官,80%以上的训练有素的帝国官吏,1918年以后继续在土耳其留任,而没有在帝国瓦解后的其他后继国家供职。共和国五任总统中有四位是以前帝国的将军。这些人都是惯于指挥调度、管理行政、处理公众问题的老手。共和国无须重起炉灶,另搞一套班底。自然,并非所有的军官和官员都是目光锐利、廉洁奉公、一心为民造福的干才。土耳其人也如普天下芸芸众生一样,对官老爷怨声载道,抱怨他们因循守旧,作风拖拉,只会说“不”,净是在规章条文和官方文件的片言只字上小题大作。小官僚常是受人嘲笑的对象,在人们眼里,他们就喜欢拿腔作调,一心只顾谋私利。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坐上办公桌,就成大角色。”不过事实证明,最高领导层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才干的。要是没有这样的领导集团,土耳其历史就无法解释了。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特权阶层把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律师——还有实业家网罗了进来。

杰出人士多集中在城市。从前面有关伊斯兰教、西化以及经济发展的诸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土耳其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大城市与外省乡镇之间的明显差异。近年来,土耳其也受到迅速都市化浪潮的冲击。据1955年人口普查报告,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6座;1960年统计有9座;到1965年,据报告已有14座。一些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差不多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多,主要是由于乡民的不断流入。土耳其各大城市的边缘,布满了占地而居的群落,其成员都是新近从农村

流散来的。这些占地而居者与其说表达了对农村贫困的绝望 还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寻求工作和教育机会的事业心。他们中许多人愿意流落到大城市来 而不愿去离家乡较近的外省城镇 这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机会，而且还因为小城镇的社会风习更因循守旧，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的到来迅速壮大了城市贫民——“戴便帽者”——的队伍 与“戴便帽者”相对应的 是比较老于世故、比较富有的“戴礼帽者”；但是“戴便帽者”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其中不少人不久前到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 干了几年非技术或半技术的工作 积攒了点钱财 然后又回到土耳其来。工会有所发展 时而也发生些小规模的罢工 但是要谈城市工人中有什么团结观念，或是形成了什么表现团结观念的群众组织 那可是将来的事了。显然 城市还算不上社会单元 而是和往昔一样 无非是住所和社区的集成。城市的基调仍由上流人士所定 对照乡村 差别可谓十分鲜明。

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 1966 年在国会演说中指出：土耳其 35000 个村落 居住着 2000 万乡民 但大部分农村缺少公路、水利系统、学校和保健设施 好多乡村至今仍用不上电。许多乡民备受贫困的煎熬 囿于无知和迷信的高墙之中。许多村民饱尝无地即地主所有制之苦。一批关注社会问题的当代土耳其文学作品 其中多数采取小说或短篇故事的形式 以同情的笔调描述农民的命运、鞭挞地主 有时还赞扬当地罗宾汉式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然而 随着公路的兴建、公共汽车的通行以及无线电的使用 每年都有更多的村落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再清楚不过的是 村民们正在逐渐觉醒 唤起了新的意愿和新的需求。这反映在二次大战以来土耳其的各项政策之中。

土耳其的共和主义 现代土耳其采取的是共和政体和民主的多党政治制度。这一成果来自于一个世纪的演变、几场革命

以及一次世界大战末土耳其战败并险遭没顶之灾的惨痛历史教训。1876年，奥托曼帝国成了第一个接受成文宪法和议会实体的穆斯林国家。而现行宪法是在1960年革命之后，于1961年制定的。在1876年至1921年这一时间跨度内，作过许多尝试，也学到了不少东西。1876年的实验，产生出一个由至高无上的苏丹统治的君主立宪政体。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苏丹的权力削弱了，然而只是在阿塔图克的领导下，才宣布民众享有绝对主权。自1923年共和国成立以来，对民众享有绝对主权这一点从未有过异议。有二十多年，由一个政党实施民众主权。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多党政治取代了一党制。经历多次危险，多党政治还是幸存了下来。受到来自极左或极右集团的两方面挑战，土耳其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不但要把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而且还要把广大市民、农民和城市工人，融合在秩序井然的多党政治之中。

1950年，民主党通过和平选举，推翻了过去一向是共和人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自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之后，农民发现了自已的政治力量。阿塔丘尔克以前曾说过：“农民是我们的主人。”一些城市杰出之士把这看作是幽默的夸张，但他们现在也只得万般无奈地承认，这话近乎真理。农民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持传统的怀疑态度。在他们眼里，所谓政府，无非就是那些收税人和拉壮丁的警官。但是他们也需要政府给他们带来的物质便利——农业资助、公路、学校和保健设施。一个多世纪以来，先是奥托曼帝国，尔后是共和国，逐步扩大了政府的活动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征税、司法、治安、保卫疆土等传统职能。现在农村也能点点滴滴地享受到某些其他好处。政客为了诱使农民投他们的票，免不了要作一番许诺。无线电广播很起作用。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一个民众社会正在缔造过程之中，而乡

村咖啡室里的收音机也从旁助其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一代文盲能在识字读报之前就骤然跃入全国性生活热潮之中。1963年土耳其登记在册的1816000台收音机，将近有1/4在农村。

土耳其的政治生活有时也会风云骤起——不单是大国民议会中的激烈辩论，还有势不两立的政党、名人在报纸上的相互攻讦。观点上的冲突会导致行动的终止，从而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再说，一党统治的传统也有可能死灰复燃。然而，从整个情况来看，土耳其人似乎决意让多党民主奏效。在此期间，军队一直置身于政治之外，但仍作为共和国的捍卫者留守在边界线上。军队在若干紧要关头也出面干预过土耳其的政治。最后一次是在1960年，当时它废黜了镇压反对派的民主党政权。军队是否会再次进行干预，这取决于政治领导的质量和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气氛，同时也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土耳其的对外政策 现代土耳其的对外关系是平和的，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良好的。奥托曼帝国与其邻国连年战火不断。1922年土耳其人赢得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之后，共和国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它的目标是保持绝对的独立和国土的完整，这一目标已经成功地加以实现。在土耳其的六个邻国（苏联、希腊、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中，苏联的威胁最大。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保持中立，大战结束时，苏联人对土耳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割让领土并给予他们保卫海峡的特权。过去两百多年来一直承受受到这种压力，再加上俄土两国多次交战的这段历史，不能不使土耳其人特别小心提防。所以他们在1947年以后一直接受美国的援助，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另外还接受其他的经济援助。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到1964年以前，土美关系一直很密切。打那以后，土耳其政府虽然对美国仍然十分友好，但是开始着手缓和同苏俄的关系，

苏俄放弃了箭拔弩张的威胁姿态，而且主动表示愿意提供经援。1966年土耳其外长说：“我们穿的不是同一颜色的衣服。”不过，他接着又说同苏联建立睦邻关系还是有可能的。土耳其另一个邻国希腊，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土希关系一向不错，可是到了1963年底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重又爆发尖锐冲突，1967年再次发生冲突，关系遂趋于紧张。塞浦路斯引起了土耳其学生的反美示威，因为在这场争端中美国没有支持土耳其。但土美关系的紧张，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美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存在过于明显，而对任何一个大国的过分依赖势必招致怨忿。同样，以往的史实有助于解释这种反响，奥托曼旧帝国深受西欧列强经济奴役和治外法权之害，饱尝政治、军事干涉之苦，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土耳其人极其敏感，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的完整，绝不能有丝毫损害。

土耳其与其他四个邻国的关系，各有不同。和伊朗的关系一般说来还不错。两国都是军事经济合作同盟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长达数世纪的土伊边境冲突不复存在。在最近几年，与共产党集团成员保加利亚几度出现过紧张关系，不过两国关系也很容易得到改善。伊拉克和叙利亚给土耳其提出了特别的难题。这两个阿拉伯国家近年来都得到苏俄的支持。土耳其人很清楚，如果俄国人不但从苏俄边境，而且还在邻接伊叙两国的土耳其南部边境施加压力，那么他们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与此同时，安卡拉政府不但谋求同伊叙两国，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同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过去几年内土埃关系十分冷淡，达成更大程度的谅解。土耳其人承认以色列，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均不予承认。此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他们还需要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兄弟的支持。60年代中期，土耳其派出亲善代表团去若干阿拉伯国家访问，接着又进行其他正式访问。土耳其

一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所面临的障碍，是阿拉伯国家对过去的历史事实仍耿耿于怀：它们受奥托曼土耳其的统治长达四个世纪之久。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将大大有助于土阿双方关系的改善。

在这个充满紧张不安的世界上 土耳其正在奋力前进。由于它在共和国期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由于通过学术研究 世界各国对土耳其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西方人彻底改变了对土耳其人的陈旧看法 不再把他们看作是“野蛮人”、“破坏者”。而 1919 年协约国在回敬参加巴黎和会的奥托曼帝国代表团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 或是在非洲 都找不到任何事例，可以说明凡是土耳其曾确立其统治的国家未曾出现过物质繁荣的消退，未曾出现过文化水平的下降……不论在欧洲的基督徒中 还是在叙利亚、阿拉伯和非洲的穆斯林中 土耳其人最拿手的一招 就是征服到哪儿破坏到哪儿；他们从未显示过自己能够和平地发展他们靠战争赢到手的東西。他们的才干决不在这方面。

如果说在那时 这种态度已有失公允 那么到现在 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了。在过去 如同在现在 土耳其人显示了堪与古代罗马人和中世纪北欧人相媲美的组织、建设才能。他们也像古罗马人和北欧人一样，十分看重而且还将继续珍视勇敢、坚韧、纪律等军人气质。他们在体育方面所崇拜的偶像 看来就是那些为土耳其赢得国际比赛和奥林匹克冠军称号的孔武有力的摔跤运动员。他们往往吝于言辞，初交时神情似乎还略带几分严厉。

其实他们也很友好、慷慨，有时机智横溢，谈锋甚健。他们沉着自信，富有求实精神，具有分析因果关系的基本推理能力。作这样的一般性概括，难免有片面武断之嫌。正如在这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中有各色人等，土耳其人也属多种多样。然而，凡是了解土耳其的人，都会证明这些判断并非言过其实。

土耳其也意识到自己从各种古代文化——从早期突厥族、从伊斯兰教、从奥托曼帝国、从西方——继承到丰富的遗产。他们生活在“旧”与“新”的包围之中，周围有丰碑式的赫梯族雕刻、罗马圆形剧场、拜占庭镶嵌工艺、塞尔儒克族的商队客栈、土耳其民间音乐、奥托曼清真寺、柏油马路以及高压电缆。往昔推动着现在，如同现在推动着将来。

安卡拉乌鲁斯广场座落在一条现代化的林荫大道上，毗邻旧城区。广场附近有古罗马奥古斯都古庙、中世纪拜占庭城堡、15世纪哈基·拜拉姆清真寺、现代化火车站。当民族主义运动决定将政府设在这个地区之后，这儿就建立起了第一批政府办公大楼。一座阿塔图克身跨骏马的雕塑像，俯瞰着整个广场。雕像底座上刻有一幅浮雕，画面上是棵大树，一根粗枝在树干处豁然断开，而大树顶上萌生出一丛生机勃勃的新枝嫩叶。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托曼帝国的躯壳中脱颖而出。新生的土耳其从旧帝国那儿接过了它的子民、土地、宗教以及许多问题。共和国既是从帝国的失败与崩溃中傲然崛起，也是在帝国的经验和进步中脱颖而出。那个帝国本身有着600年的历史。它是由土耳其人缔造的。现代土耳其的历史渊源，可以由奥托曼帝国时期追溯到奥托曼以前的突厥族年代以及伊斯兰教以前的年代。

## 第二章

### 从草原到帝国

近年来，土耳其人对自己的民族起源显示了特殊兴趣。过去未必一直是这样。在奥托曼帝国大部分年代里，土耳其人写的或念的历史，尽是有关奥托曼王朝及国家的历史，再不就是伊斯兰宗教史。然而到了 19 世纪末，有些奥托曼知识分子开始对操土耳其语的“族兄”产生较大的兴趣。这些“族兄”散居在从伊朗西北部和高加索经土耳其斯坦（起初受俄国威胁，不久即置于俄国控制之下）直至中国这样一片横贯中亚西亚的广阔地带。由于受到西欧学术研究成果的推动，有些土耳其学者也开始深入探究土耳其民族的人种及语言历史。

探究民族起源，作为增强现代民族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并非为土耳其人所特有的做法，但是他们开始搞这项研究，却晚于曾受他们统治过的希腊人、斯拉夫人和亚美尼亚人。作这项研究也的确比较困难，因为奥托曼帝国及伊斯兰教这层覆盖物，把土耳其民族的过去完全遮掩住了，甚至同为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也比土耳其人保留着更多的民族意识。意识到自己属于阿拉伯民族或波斯民族。对土耳其人来说，之所以难于保留其土耳其民族意识，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书写、甚至说话的语体文